



动画电影符号学

陆方◎著

 科学出版社

动画电影符号学

陆 方◎ 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通过对优秀动画作品的表现要素和叙事方式的分析,揭示动画电影表现手法与受众对动画电影辨识度之间的联系机理,帮助中国动画制作者在制作过程中能准确表达动画作品的意义与内涵,为促进中国动画电影产业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本书内容的针对性和实用性较强,注重动画理论与产业相结合,使读者能够直接运用符号学分析方法,解决动画电影研究中的具体问题。

本书适合从事动画理论研究与教学的工作者和研究生阅读,也可供动画爱好者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动画电影符号学/陆方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7.3
ISBN 978-7-03-052051-7

I. ①动… II. ①陆… III. ①动画片—电影符号学 IV. ①J9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47587 号

责任编辑:杜长清 / 责任校对:邹慧卿
责任印制:张 伟 / 封面设计:黄华斌

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7 年 3 月第 一 版 开本:720×1000 B5

2017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12 1/4

字数:203 000

定价:8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前 言

多年来，中国动画电影发展滞后的原因被简单地归结为缺少资金和技术滞后等表面问题。国内外大量研究表明，动画电影表现要素的正确运用与动画电影叙事方式的合理安排，不仅有助于加深观众对电影内涵的理解，使一部动画电影能够历久弥新，而且会带动受众对续集的关注并产生连续的票房收益，进而拉动动画产业链的发展，引导动画产业衍生产品市场的良性发展，从而补给动画电影产业。

因此，本书首先研究动画文化与动画形象的基础理论，拟在批判性的动画理论基础上，建构实践性研究，为动画理论研究开创一个新层面。其次，本书通过结合国内外学者相关研究成果，结合中国本土动画文化特征，基于符号学的研究方法，从符号特征和文化内涵的角度切入研究动画文化和动画形象，探究动画文化的深层结构和动画形象的符号意义，进而指导当前的动画实践。最后，本书建立整合叙事学与符号学理论的动画电影研究模型，对国内外优秀动画作品的表现要素和叙事方式进行分析，从而为促进我国动画电影产业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本书的研究工作得到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15YJC760069）、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L16CZW001）和大连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2016dlskyb186）的资助和支持。由于作者学识有限，本书难免存在不足之处，诚恳地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作 者

2017年1月

目 录

前言

第 1 章 什么是符号学	1
1.1 符号学	1
1.2 符号学的灵魂——索绪尔和皮尔斯	6
第 2 章 符号的定义	16
2.1 什么是符号	16
2.2 神话和象征	20
2.3 索绪尔的符号	30
2.4 皮尔斯的符号	35
第 3 章 符号的关联	42
3.1 符号学和结构主义的视角	42
3.2 意义传达和意义作用	45
3.3 巴尔特的意义作用的理论	46
3.4 两项对立和格雷马斯的符号学的四边形	56
第 4 章 符号的一般类型和视觉语言	66
4.1 视觉符号的特征	66
4.2 视觉语言的构造要素和属性	67
4.3 视觉语言的理论	80
第 5 章 设计创意和创造性	84
5.1 设计创意的创造性问题	84
5.2 日常的符号	90

第6章 符号语用的问题	100
6.1 符号学的三分法——语法学、语义学、语用学	100
6.2 艺术和设计的符号语用学	115
第7章 动画电影沟通和符号学	122
7.1 人类沟通的符号学理论	122
7.2 艾柯的符号学的沟通模型	123
7.3 动画电影沟通的符号学理论	128
7.4 动画电影沟通的符号学语义理论	130
第8章 动画电影的意义生成构成的符号学接近	133
8.1 意义生成构造的概念	133
8.2 意义生成构造的类型	135
8.3 构建动画电影的分析模型	136
8.4 实例分析	138
参考文献	186

第 1 章 什么是符号学

1.1 符 号 学

1.1.1 符号学研究什么

20 世纪初，索绪尔在瑞士日内瓦大学讲授普通语言学，曾有过关于符号科学的设想。他说：“我们可以设想有一门研究社会生活中符号生命的科学。它将构成社会心理学的一部分，因而也是普通心理学的一部分，我们管它叫符号学；它将告诉我们符号是由什么构成的，受什么规律支配。因为这门科学还不存在，我们说不出它将会是什么样子，但是它有存在的权利，它的地位是预先确定了的。”语言学不过是这门一般科学的一部分，将来符号学发现的规律也可以应用于语言学，所以后者将属于全部人文事实中一个非常确定的领域。

从这段引文可以看出，索绪尔设想的符号学是“一门研究社会生活中符号生命的科学”。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中，索绪尔着重研究的是语言符号学，但他指出了“语言学不过是符号学这一学科当中的一部分”。差不多同一时期，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皮尔斯也提出了关于符号学研究的设想。

皮尔斯认为，符号学是一门形式科学，也是一门规范科学。作为形式科学，它关注符号学的特性和用途赖以成立的必要条件和基本条件。它有三个分支，即语法学、逻辑学和修辞学。这种划分与西方古代教育的“三艺”——语法、逻辑、修辞三门课程相对应，似乎不是偶然的。作为规范科学，它是在真值问题上关注符号。符号学不仅涉及对符号的描述和定性，而且涉及符号在探究中的应用，以及符号被用来劝说和达成共识的手段。语法学或称句法学，是对符号形式特

征及表达方式的研究。作为语法学，它的一般条件是：①一个符号的形体必须指称一个对象；②符号形体决定一个解释项；③符形、对象和解释项必须是一种三元关系。

逻辑学关注的是符号被用来鉴别真相的方式。皮尔斯说：“在一般意义上，逻辑学，正如我已经说明的，仅仅是符号学的另一个名字。”符号学研究符形如何指称对象，用以“鉴别真相”，自然是说符形指称对象的真或假。从某种意义上说，逻辑就是研究真假的。由此不难理解，逻辑学就是符号学的“另一个名字”。

符号是修辞学探究在某一社群中被用来传达和表达主张的方式。符号学对于符形与解释项之间关系的研究为修辞学。亚里士多德曾认为，修辞学就是一门用于说服的科学。修辞是通过话语的表情达意，用以取得最佳的交际效果。皮尔斯常常在这三个分支学科前面冠以“纯”、“一般”或“普遍”等字样，大概是为了区分人们日常应用的语法、逻辑、修辞三个学科。

皮尔斯对符号学的三种分法直接影响了美国哲学家莫里斯的符号学说。莫里斯自称是皮尔斯的解释者，他把符号学三分为语形学、语义学和语用学。语形学研究符形之间的关系，语义学研究符形所传达的意义，而语用学则研究语境中的意义问题。莫里斯对符号学的三种分法或许更容易被人们理解和接受，因而在符号学界产生了更为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随着符号学研究的发展，符号学家们从符号的三元结构进一步关注三元关系中三个项之间的关系，具体说来，就是符形与对象之间的指称关系，符形与解释项之间的意指关系。

在符号化的过程中，只有通过用一事物去指称另一事物，才能形成“符形—对象”的结构关系，符形作为讯息的载体，使人们获取对象讯息成为可能。表征也是指称，如果就符号的表征方式而言，主要表现为像似的方式、指索的方式和象征的方式。现代符号学把符号区分为像似符号、指索符号和象征符号三类，恰好体现了三种不同的表征方式的意指的作用，使能指（符形）和所指（符释）结合成为符号的二元结构。因此一些符号学家，包括皮尔斯和艾柯，都十分强调符号学要研究符号的意指作用。符号的意指作用是通过意指方式实现的，而意指方式则多种多样。例如，一件物品上有一个“骷髅”图像，当人们看到这一图像时就会立即联想到死亡，便可以大致得出认识：这种东西很危险。这是联想和推理的意指方式，同时也是一种约定。又如，古代汉字符号“吾”字，字形即符形（能指），字的音义为解释项（所指）。“吾”是代词，可以作为主语

和宾语，这是语形的意指方式。“吾”是第一人称，当“我”字讲，这是语义的意指方式。《孙子·始计篇》云：“吾以此知胜负矣。”“吾”指孙武。《荀子·修身篇》说：“谄谀我者，吾贼也。”“吾”指荀况。这是语用的意指方式。当然这些意指方式并不是彼此不相关的。语形、语义或者语用方式同时也会是联想、推理或纯粹约定的方式。把符号学划分为语形学、语义学和语用学三个组成部分自然是很有道理的。

至此，对于“符号学研究什么”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清晰的了解。符号学研究符号的三元结构。更为本质地说，符号学研究符号的指称和意指方式。因此可以说：符号学就是研究符号三元结构及其指称和意指方式的科学。

1.1.2 符号学的疆域

符号学的疆域是极为辽阔的。罗兰·巴尔特说，符号学“以所有符号系统为研究对象”。人们虽然不能证实整个世界是由符号所构成的，但是人们确实看到了世界上的所有的事物都可以作为符号，所以说世界上的事物都可以成为符号学的研究对象。

20世纪70年代，意大利符号学家艾柯在他的《符号学理论》一书中，描绘了一个全景式的符号学疆域，艾柯列出的一些学科并不完全，学科间的分界也不够清晰。在此之后符号学家们描绘的符号学疆域更为辽阔。

符号学辽阔的疆域，让一些符号学家产生了被称为“符号学帝国主义”的思想。这些符号学家们认为，符号学应像古代哲学那样，建立一个包罗万象的综学科，并且告知天下符号学有权侵入任何一个学科领域。“符号学帝国主义”的思想很明显是错误的。虽然符号学的研究对象涉及各个学科，并不是说要把各个学科都“兼并”过来。就好比说，物理学的研究对象涉及整个物质世界，但它并没有把研究物质世界的其他学科占为己有。

同“符号学帝国主义”刚好相反，有一种可以称为“偏安一隅”的符号学倾向。还有一些符号学家像南宋小朝廷那样，自愿将自己所拥有的大片的疆土让给其他人。征兆不是符号；“症候”不是符号；电闪雷鸣使人们联想到要下雨了，不是符号；信号不是符号，因为信号所处理的只是零星的不关联的表象或感觉，而不是系统；镜像不是符号，据说符号的对象总是不在场的，而镜像符

号对象“在场”；记号不是符号，如人们读书时在书的空白的地方所标记的各种记号。

像似符号和指索符号都不是符号，只有“象征符号”(symbol)才是符号。这就好像是自甘“偏安一隅”。既然“符号学帝国主义”是错误的，自甘“偏安一隅”也是不正确的，那么符号学的疆域到底应当怎样划定呢？

科学的划分符号的疆域，就在于各种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符号学的研究对象就是“符号”(sign)，是符号的“三元”关系，是符号的“指称”和“意指”方式。任何事物，只要符合“符号”条件的都是符号。当然，“符号”可能也为其他学科所关注，但是其他任何学科关注符号都只是一种“兼职”行为，这些学科不会以符号的“三元”关系和“指称”、“意指”方式为主要研究对象。相反地，只有符号学才把它们作为专门的研究对象。符号学分析探究它应当研究的内容，不研究它所不应当研究的内容。

符号学作为当代流行的一门现代科学，它需要在人类的科学体系中认清自身的地位，不能自以为是、骄傲自大，也不能随意的妄自菲薄。应该像 C. 布雷蒙所说的那样，要尽量避免陷入乌托邦帝国主义和自暴自弃的两极陷阱。符号学应当很清楚地划出自己学科的研究对象，从中划出属于自己的研究疆域。

1.1.3 符号学与符号学思想

“符号学”与“符号学思想”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虽然两者有联系，但也应该区别开来。符号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诞生于 20 世纪初，它的历史很短。符号学思想是关于符号学的一些具体的理论或观念，存在历史悠久。

符号学思想最初发端于古希腊希波克拉底的“症候学”。之后，亚里士多德探讨过语言符号问题。“口语是内心经验的符号，文字是口语的符号”，这便是亚里士多德的名言。斯多葛学派的“Lekton”，如果解释为“关于对象构想的声音”，几乎近似于现代符号学“三元结构”的思想。罗马时期，奥古斯丁和他的继承者们发展了神学符号学的研究。中世纪的唯名论和唯实论，围绕名称的本性，即名实关系的争论，有些像中国先秦时期的“名实”之辩。近代的洛克和莱布尼茨，都为符号学的研究做出了贡献。特别是莱布尼茨，他有一个极其伟大的设想：“创立一种全人类通用的符号语言用以消除自然语言的歧义性。”这种语言可以根据规

则，构成像数学那样精密的“思维的演算”。他的设想直接导致数理逻辑的建立和计算机的发明。

中国的传统文化，也积淀了丰富的符号学思想。早在数千年以前，《易经》就建立了一个完整的符号系统，不仅有语形学，而且有语义学和语用学，这不能不说是符号学史上的一个奇迹。春秋战国时期，各个学派关于“名实”的争论，是中国文化史上对符号问题进行探讨的高峰时期。这一争论甚至绵延两千余年，同今天国际上的语义学研究接上了“轨”。方块汉字是一种特殊的文字编码，“六书”即是编码规则。汉字学的研究历史悠久，古代汉字学的研究成为“小学”，包括研究符号能指的文字学和研究所指的音韵学和训诂学。《说文解字》一书影响深远，形成了两千年来“《说文》学”的学术思潮。中国古代音乐、中国书法、中国绘画、中国建筑等，也都体现了中国艺术符号思想的独特风格和深厚底蕴。中国传统文化是一座蕴藏着丰富的符号学思想的宝库。

然而，这些丰富多彩、辉煌耀眼的学术成就，实际上只是一些具体的符号学理论或观念，还不是很完整，所以只能称之为“符号学思想”，而不是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符号学”。

符号学，要想成为大家公认的符号学，那么它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首先，它要有一个明确而且独特的研究对象。作为一般符号学，就是研究符号的结构、系统以及指称和意指方式的科学。如果它是部门符号学，则还需要加上其部门的符号特征。

其次，它要有一个确定的学科体系。符号学不只是研究符号，它还必须建立起相应的理论体系。

最后，还需要得到公众的认可。一个“公认”的符号学理论体系，这是符号学学科成熟的一个标志。

目前的符号学界学派林立，符号学作为一门现代科学，至今还没有一个公认的学科体系，还不够成熟。但是符号学发展形势良好，跨国性研究的规模日趋扩大。1969年，在巴黎成立了国际符号学会，出版刊物《符号学》。1988年，又在芬兰伊马特拉城成立国际符号学研究所，建立了世界性的符号学信息中心。符号学研究正在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1.2 符号学的灵魂——索绪尔和皮尔斯

1.2.1 “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是杰出的语言学家和思想家。他的思想及理论在世界文化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本人则因此而被推崇为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和解构主义哲学的先驱者之一。

索绪尔在语言理论方面的创见深深地影响了现代语言学的发展历程，构成了现代语言学的基本内容，构筑了此后语言科学的基本框架。英国语言学家罗宾斯（R. Robbins）这样评价：“索绪尔对20世纪语言学的影响是无与伦比的，可以说，是他开创了20世纪的语言学。”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给了后世学者以极其深刻的影响，英国学者莱昂斯（J. Lyons）论述说：“如果有谁称得上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的话，那么他就是伟大的瑞士学者索绪尔……现时可分出许多不同的语言学流派，这些流派都直接或间接地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的影响。”因此索绪尔被称为“现代语言学之父”。

索绪尔于1857年10月26日出生在瑞士日内瓦的一个殷实的法裔家庭里，这是一个有名望的家族，曾出过生物学家、博物学家、物理学家和地质学家等多位学者。索绪尔从小在这个环境下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和科学思想的熏陶，表现出独特的语言天赋，他学会了法语、德语、英语、拉丁语和希腊语。少年索绪尔就对语言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在不满15岁时以其语言天赋撰写了一篇叫《论诸语言》的论文。1870年，索绪尔进入马迪纳专科学校学习希腊语。1873~1875年在日内瓦公立高中对语言学兴趣盎然，他开始自学梵语，阅读葆朴的《梵语语法》和库尔替乌斯的《希腊语词源学基础》。1875年，18岁的索绪尔进入日内瓦大学，主修化学和物理学，他同时还选修了哲学、历史、艺术和语言学等课程。经过近1年的学习，索绪尔更加坚定了从事语言学研究的决心。1876年，他申请加入了巴黎语言学会。同年10月，他转学到德国莱比锡大学学习语言学，从事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1878年12月，年仅21岁的索绪尔发表了他的杰出论文《论印欧系

语言元音的原始系统》，使老一辈语言学家大为震惊。1880 年秋，他离开德国到法国巴黎高等研究院任教，教授哥特语、古高地德语、希腊语、拉丁语比较语法、立陶宛语和梵语等语言学课程，同时兼任巴黎语言学会的秘书。

在法国的 10 年，索绪尔培养了梅耶、格拉蒙等著名语言学家。1891 年，索绪尔离开法国回到瑞士，在日内瓦大学讲授印欧系语言历史比较和普通语言学。1906 年他出任普通语言学主讲教授职位，担任了三轮的普通语言学主讲教授的职位。1912 年夏，索绪尔不幸得了肺癌。1913 年 2 月 22 日与世长辞，享年 56 岁。可惜索绪尔一生述而不作，没有为自己富有创建的学术思想留下专门的著作。

索绪尔去世后，他的学生巴利和薛施葛根据部分学生的课堂笔记和残存的索绪尔手稿编辑出版了《普通语言学教程》，于 1916 年在巴黎出版，这才使索绪尔富于创见的学术思想得以为世人所认识，并在经历了最初的沉寂之后终于引发了语言学界内部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普通语言学教程》先后被翻译成德、西、俄、英、日、中等国的文字，是一部经典的传世著作，成为语言学的必修课程，其影响几乎遍及全世界。索绪尔“述而不作”的教育传播思想，由他的弟子整理成书，颇使人联想到中国的儒家创始人、教育传播家孔子和他的弟子整理的《论语》。索绪尔以其如此特别的方式，奉献给了人们一部世界级的学术名著，同时又给后人造成了如此巨大的影响，这在科学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当学者们提到语言学和符号学时，谁也绕不过索绪尔。

索绪尔从语言学出发，提炼出了结构主义思想和理论，把语言看成由各个成分按照一定的规则组织成的一个结构系统。他把系统比作下棋时各个棋子之间的规则系统，虽然棋子可以由各种不同的质料、不同的颜色做成，但是下棋的规则系统却总是不变的。我们可以把木头的象棋棋子换成昂贵的象牙棋子，也可以换成低廉的塑料棋子，这种改变对下象棋都没有什么关系；我们可以把围棋棋子的黑白两色改变成红黄两色，对下围棋也无关紧要。但是，如果我们任意减少或增加象棋的棋子数目，或者任意改变围棋的棋盘格式，那么这种改变就会深深地影响到下棋的规则——棋法。因为，棋子的质料和颜色是棋子系统外部的要素，它们一般不会影响下棋的规则；而象棋棋子的数目或围棋棋盘的格式，是这两种棋子系统内部的要素，一旦产生变化，就会牵一发而动全局。在一定规则下的棋路又可以千变万化，这些变化都必须符合棋子的组合规则。下棋的人各式各样，下棋的路子也变化莫测，但是下棋的规则却有严格的规定。例如，中国象棋，车马

炮、士象卒，将帅各率一方：马不能行象步，士不可斜飞出官，兵不过河不准横行，炮不隔山难以发威，这就是下中国象棋的规则。至于国际象棋则另有一个路数，丝毫不允许乱套。棋子好比语言的词语符号，下棋的规则就好比语言系统的语法；词语的符号形式可以变换，但是语法必须严格遵守。

在这一系统思想的指导下，索绪尔把语言学分为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共时语言学研究作为系统的语言的情况，历时语言学研究个别语言要素的演变。他又把语言分为“语言”和“言语”。“语言”属于全社会，是一个抽象化了的系统；“言语”属于个人，是具体的（包括生理、物理和心理现象）物质化了的表现形式。索绪尔还区分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外部语言学把语言跟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联系在一起研究，是宏观语言学；内部语言学研究语言系统本身的各种构成要素，可以说是微观语言学。所有这一切，提供了语言学研究中新趋向的理论基础，并由此导致了欧美结构主义的诞生和发展。20世纪以前的传统语言学重视语言的个性，研究语言的个别构成成分及其特征，用“原子主义”的方法来处理各种语言现象；而在索绪尔影响下的20世纪现代语言学，则强调语言的共性，研究语言的结构系统及其普遍特征，采用“结构主义”的方法来处理语言系统和语言现象。

正是在上述基础上，建立起语言是一个结构、一个系统的语言学观念和结构主义理论：明确界定了语言学的若干基本观念，如语言研究的共时观与历时观、语言的时空观、语言与言语、语言的内部要素和外部要素以及系统中的诸多关系。现代语言学的许多研究都是围绕着这些观念的本质和意义而进行的，它们启动和推进了现代语言学的发展，阐明了语言学的任务和基本方向。语言学的任务是研究由语言单位和语言关系构成的语言系统，这一点已经成为公认的语言学研究定义。

索绪尔的另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突破性贡献是他在结构主义理论上创建了符号学（semiotics）。他指出语言是一个表示观念的符号系统，每个符号都有它的“能指”和“所指”两重性质。“能指”即语言的声音印象，“所指”即概念。他认为语言符号联系的不是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和声音印象，所以语言符号纯粹是心理。这一观念导致了符号学的创建。索绪尔从“能指”和“所指”的关系引出“符号的任意性”，并把它定为符号学的第一原则。

为了防止人们对“符号任意性”的误解，索绪尔做了很精辟的注解：“任意性

这个词还要加上一个注解。它不应该使人想起能指完全取决于说话者的自由选择（一个符号在语言集体中确立后，个人是不能对它有任何改变的）。意思是说，它是不可论证的，即对现实中跟它没有任何自然联系的所指来说是任意的。”只有承认语言符号的这种任意性，我们才有可能面对事实，从零星、孤立的表面现象进入支撑符号的基本结构。

为了区分语言与言语，他将言语交际过程称为言语循环，并将其视为由心理过程、生理过程、物理过程构成的复杂现象：“言语行为需要至少两人参加。言语循环的起点是对话者之一甲的大脑，在这里，被称为概念的意识事实与用来表达它们的语言符号的表象或音响形象联结在一起。假如某一个概念在脑子里引起一个相应的音响形象，这完全是一个心理现象。接着是一个生理过程：脑子把一个与那个音响形象对应的冲动传递给发声器官。然后声波从甲的口传入乙的耳——这是纯粹的物理过程。随后，活动在乙方以相反的方向持续：从耳朵到脑子，这是音响形象的生理传递；在脑子里，这音响形象与相应的概念在心理上联结。如果乙方说话，新的行为就继续下去——从他的脑子到甲方的脑子——进程完全同前。”这样分析后，他首先把物理过程撇开，心理部分也不完全与社会相关。语言具有社会属性，潜存于言语社团成员的脑子里。任何个体脑子里的语言都不完备，它只有在集体心智中才完全存在。在索绪尔看来，语言符号系统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存在。每一符号都是音响形象与概念的结合体，存在于个体意识和群体共识。如此看来，语言符号同时存在于社会世界和心理世界。符号内部、符号与符号、符号与世界、符号与个体、符号与群体之间存在复杂关系。这是对语言复杂性的洞见。

索绪尔关于言语交际的解释被后人称为“代码模式”（the codemodel）。这一模式有三个显著特点：①个体意动是观察的切入点，但个体不是外界刺激的接受者；②分析的对象不仅是个体的说或听，还包括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的信息传递；③言语循环中双方的沟通以语言符号系统为基础。

这种既从个体视角建构言语交际模式，又从中抽象出群体共有的语言符号系统的研究方法是索绪尔的创见，为现代语言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索绪尔“代码模式”论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19世纪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成果。蒂博认为，索绪尔对言语循环的阐释与美国心理学家、教育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的观点相似。杜威认为，个体不是外部刺激的被动接受者，而是主动感知者。他

的观点受德国意动（意向主义）心理学家布伦坦诺（Franz Brentano）的影响。“语言是社会事实”这一论断受索绪尔同代人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Durkheim）的影响。集体心智（collective mind）概念是涂尔干在他1895年出版的著作《社会学方法论》中提出的。他指出，社会学研究的现象既不同于物理现象又不同于心理现象。社会事实是社会成员集体心智中的观念。它们就像石头和力一样都是客观存在。在索绪尔看来，符号及符号之间的关系以及符号构成的系统都存在于集体心智。每个言语社团成员说话发出的声音都不尽相同，然而同一个符号的音响形象却是共有的。这种区分对后来音位学和语音学的分别确立和发展产生了直接影响。

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是语言学发展的一个转折点，标志着现代语言学的形成，为以后各语言学流派奠定了基础。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更为符号学的诞生提供了构思。索绪尔把语言定义为符号体系并归结为心理现象的同时，又认为语言研究虽然纯粹是心理的，但语言的本质属性是社会的；言语是个人的、心理的、物理的，但是作为言语的集合——语言则是全社会约定的符号系统。因此，言语只是个人对语言符号的具体运用，即语言符号的规则性组合而已。这样，语言符号有可能在以后的研究中成为“元符号”体系，用来分析和解释其他一切符号，成为符号学的基础。他的继承者丹麦语言学家叶尔姆斯列夫（1899—1956）出版了《语言理论导论》和《语言论集》，为后来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法国语言学家本维尼斯特（1902—1976）有关“陈述活动语言学”的研究成果，使符号学借助于陈述来掌握意义成为可能，从而形成话语符号学的概念和研究方法，因此符号学更靠近了言语活动的实际情况。

索绪尔语言理论中第一个突出的特点是把语言和言语严格地区分开来。他认为人类的言语行为是一个多方面的综合体，包括物理的、生理的、心理的、社会的、个人的各种因素。言语行为可以分为两部分，即语言和言语。语言体现了言语行为中的心理的、社会的因素，是言语行为中主要的、独立自主的部分，而言语则体现了言语行为中心理的、物理的、个人的因素，是言语行为中的次要部分。这样一来，就把社会和个人主要的和次要的部分区分开来，把语言看做一种纯心理的社会现象。所谓纯心理就是说语言不是由物质的东西构成的，语言中的语音不是一种物质的、纯物理的声而是一种“音响形象”，这完全是一种声音的心理印象。但他并不把语言看做个人的心理现象，而把它看做一种集体的、社会的心理

现象，个人既不能创造它，也不能改变它。语言是一个社会的所有成员所作的某种约定，社会性是它的内在特性之一。

语言是一个表达概念的符号系统，这是索绪尔语言理论中的一个主要的出发点。语言符号是所指（概念）和能指（音响形象）结合在一起所产生的一个整体，这二者是不可分离的，如果缺少了其中的一个，语言符号便将化为乌有。他打了一个比方，水是由氢和氧组成的化合物，如果把这两个元素分开来，则任何一个元素都不具备水的特性，他又把声音与意义的关系比作一张纸，思想是正面，声音是背面，你剪了纸的正面必然也剪了它的反面。

索绪尔的价值学说实际上表明了他对语言的看法。这个学说的中心思想非常明确，语言中只有对立和差别。因此，一个语言要素要由环绕着它的其他要素来决定。语言符号本身没有意义，要借助于它之外的以及它周围的东西才能真正确定它的内容。语言的任何要素都要放在整个系统中和其他要素进行比较，在对立和差别中才能确定它们的价值。总之，语言的特征就在于它是一种完全以具体的单位的对立为基础的系统，语言要素只是由于它们的对立才产生自己的价值。索绪尔也运用这个观点来说明语言系统，他指出，语言系统是一系列语音上的差别和一系列观念上的差别结合在一起所产生的一个价值系统。索绪尔的语言学说中还有另一个值得重视的理论，那就是他对语言结构关系的分析。他很强调关系，在他看来，语言中一切均以关系为基础。他把语言的结构关系分为两种，即组合关系和联想关系聚合关系。

1.2.2 美国符号学创始人——皮尔斯

几乎与索绪尔同期，美国哲学家、逻辑学家、自然科学家查尔斯·皮尔斯也独立提出了符号学理论，成为美国实用主义和符号学的创始人。

1839年9月10日皮尔斯生于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他的父亲是一位有着虔诚宗教信仰的著名数学家，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皮尔斯从小接受良好的哲学和科学的训练，他能背诵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他6岁起就学化学，12岁开始做实验，后来转学动物学。皮尔斯曾在哈佛大学就读，在美国海洋和大地测量观察所任职，但一生很不得志。1887年以前一直未能在大学谋到一个正式的教席。在哲学上，皮尔斯提出了作为实用主义核心的意义理论，把观念的意义和实际的